

读书心细丝抽茧,练句功深石补天。——柯灵

李二召  
从政记

## 47 劝访

副县长们这几天都忙着拉票,不仅要设宴表达心情,还要送上纪念品。缝绍德的几个哥儿们干脆到代表团驻地施加压力,连哄带吓地做团长们的工作。说不仅保缝哥连选,还要高票。

如果有人敢不投,到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对这现象,组织部门不能说不知,可知道了又能怎样?这已成了地方政权组织换届的普遍行为,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因为在今天议程中,有重要的人事选举,不仅要选出新一届政府正、副县长,还要选出人大正、副主任、人大常委和法院院长、检察院检察长。

二召一进会场就发现,今天与前几次大会不同,几乎没有一个空位,而且代表们都十分兴奋。几个副县长也与众不同,他们都兴致勃勃,脸上堆着异样的微笑,看了有点怪怪的。他们不约而同与过道边的代表握手招呼着,像是已投完票,宣布自己再次当选的那个场景。二召知道,那是几个副县长按捺不住的忐忑不安情绪搅动的,当然也夹带着让代表“投我一票”的再次暗示。

挂钟指针已指到八点,这是正式开会的时间,可是,主席台上第一排的执行主席们,不知何因仍未就座,庄重的会场开始骚动。二召身后的两个代表暗议起来:“是不出岔了?”“咋整?上级组织部门妥善安排呗,换个地方照旧当官。咱邻县的刚选完,两个副县长落选,据说都安排了,一个是市交通局副局长,一个是民政局副局长。”

此时,政府办主任李顺道快步来到二召身旁耳语着,二召放下报纸,同李顺道出了会场。因为县委书记商红雨到现在没来,大家知道是发生了点意外,但又不知道究竟是啥,都把目光集中在仇长喜脸上,但在仇长喜脸上,根本辨不出一点蛛丝马迹。

这时,商红雨急匆匆从外面进来,坐下后又看了看表说:“开会时间已经过了,现在有个紧急情况,刚刚接到省政府一个紧急电话,通报我县上河堡乡四道岗村一百多名村民越级到省府上访事件,村民反映村干部卖地贪污行为,这些人情绪激动,已把省政府大门堵住,公安机关动用了警力。”

“目前看负面影响是有了,主管副市长已批示,要求县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到现场解决问题,把上访村民领回去。”说到这,商红雨瞅着仇长喜,说:“你看谁去比较合适?”仇长喜说:“既然省领导点名让主

要领导出面,我看就由我去了。”商红雨说:“人代会到了选举的节骨眼儿,进行得正常还行,要是有个啥情况……即使没啥情况,你们班子成员也要登台集体亮相,你不在场恐怕不好。”

商红雨和仇长喜听了都沉默不语。谭和看手表,眼珠左右转了两转说:“我提个建议,长喜和绍德都脱不开身,这事儿,派个副县长就行了。”商红雨说:“我看老谭说的在理,只要人能领回来,去个副县长也行嘛。当然,在选举这个节骨眼儿上,可能都不大愿意去,具体派谁?长喜由你定吧。”谭和见谁都不愿抱刀,有点坐不住了,说:“我看李二召最合适,他家在省城,关系又熟,上头有点啥不满意的,都好照应。”说完偷偷同缝绍德交换了一个眼神儿。商红雨瞧着仇长喜,仇长喜眯眼不动声色。

令大家没想到的是,二召立马就应允下来。李顺道和信访办主任寇书陪同二召坐在一个车里。寇书把情况向二召做了介绍。原来四道岗村书记叫缝富贵,在国家征用土地时,村民怀疑他有贪污行为,要他将账目公之于众。缝富贵依仗缝绍德这个未出五服叔叔的权势,不把村民放在眼里,打击报复挑头闹事的村民。村民选出代表到乡、县政府上访,碍于缝富贵与缝绍德的关系,信访部门只一味地劝说,表面上把上访村民劝了回去,实际上酿成了规模更大的越级上访事件。

二召坐在副驾驶位置,眯着眼,没一点反应。寇书说:“看看李县对这件事还有啥不清楚的,有啥指示没?”李顺道讨好地说:“李县真够用,选举的关键时刻,连个价钱都不讲,让干啥就干啥。”二召说:“按照你的意思,讲价钱是应该,不讲价钱倒不正常了?”李顺道说:“这事儿要搁在其他人身上,能讲出一大堆不去的理由。”二召说:“怎的,想选上,在那顶着就行?”李顺道觉得自己有点话多,便转了话题,说:“李县的行为把我们都感动了,你放心好了,到时你不用吱声,就在车里坐着,让省里知道我们县领导来了就行了,具体工作由我和寇书做,我不信,这拨小子还不服天朝管了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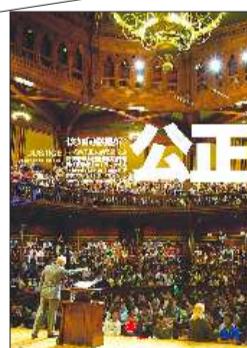
司机老赵很明事理,知道此次出车不同以往,一小时路程只四十分钟就稳稳地开到了。此时的省政府门前仍乱糟糟的,上访村民与警察已对峙了两个小时,有两个妇女打着一个白布横幅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,“要求省政府严惩大贪官缝富贵吃民肉喝民血的罪恶行为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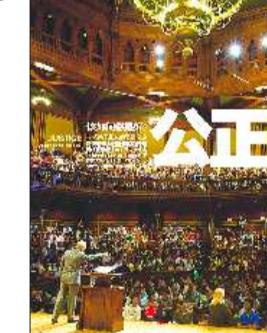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他的第一次海上长途航行。他没有听取朋友们的建议,而是“怀揣年轻人的梦想”,认为这次旅途会使他成为一个男人。可悲的是,结果并没有这样。四名被困的船员在救生艇上凝望着地平线,希望能有一艘船经过并解救他们。在最初的三天里,他们按定量分食了部分甘蓝。第四天,他们抓住一只海龟,并以这只海龟和剩下的甘蓝维持了一些日子。然后,连续八天,他们什么都没吃。

当时,男仆帕克蜷缩在救生艇的小角落里。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喝了海水,并因此生了病,看起来快要死了。在他们经受严峻考验的第19天,船长达德利建议用抓阄来决定让谁死,这样其他人也许能够活下去。但是布鲁克斯拒绝了,因此他们没有抓阄。接下来的这一天,仍然不见别的船只。达德利让布鲁克斯把目光移开,并向斯蒂芬斯示意,他们不得不杀掉帕克。达德利作了个祷告,告诉男孩他的大限到了,然后用一把袖珍小刀刺进他的喉部,静脉杀死了他。布鲁克斯摆脱了那来自良心的谴责,分享了这可怕的施舍。三人以男仆的尸体和血为食,又支撑了四天。

救援终于来了!达德利用犹豫而委婉的口吻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获救过程:“第24天,正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”,一艘船只终



## 7 功利主义



◆书名:《公正》  
◆作者:(美)迈克尔·桑德尔  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84年夏,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,远离陆地一千多英里。他们的船——“米尼奈特”号在一场比赛中沉没了,他们几个人逃到救生艇上,只带有两罐腌制的芜菁甘蓝,也没有淡水。托马斯·达德利是船长,埃德温·斯蒂芬斯是大副,埃德蒙·布鲁克斯是船员——据报纸报道,“这些人全都具有高尚的品德”。这组船员中的第四个成员是船舱男

仆理查德·帕克,年仅17岁。他是个孤儿,

## 7 赵家楼的火光

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,在5月1日、2日披露于全国各家报端。5月1日上海《大陆报》的北京通讯中说:“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,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,业已失败。”

5月2日,身为总统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,也在北京《晨报》上发表文章,证实了这个噩耗。一时间,举国皆惊,四海同悲,如同国殇。那种“中国就要亡”、“中国的处境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”的危机感,把全国民众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悲痛之中。

林长民在5月2日发表在《晨报》上的这篇题为《外交警报敬告国人》一文,事后被认为是“放了一把野火”,点燃了五四的游行。林在文中沉痛地写道:“胶州亡矣,山东亡矣,国不将国矣!”林这样哀叹是由其根据的,作为总统府内的核心人物,林亲眼看到外交总长陆征祥致大总统、总理的密电。

陆征祥在来电中不仅详述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议决,而且还主张在有这样条款的“和约”上签字。陆表示“对日关系,公约虽不签押,而日本仍可根据一九一五年约,向我直接请再订约,将所允日本之条件,完全承认。倘彼时势仍不能不签,则较之现在公约签字,事实则一,威望更逊。”林无法透露这些外交细节,但他的《外交警报敬告国人》一文正是针对这一情况写的。

通过林文,中国人对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已经深信不疑。5月3日,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,包括学界、政界、商界、军界等,都赶紧举行了各种集会,议论纷纷,商讨如何抗议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方

案。

当日下午,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迅速召开全体职员会议,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,即现在的中

山公园开国民大会;同时分别致电各省各团体,号召同日举行大会以壮声势。会议还决定把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。

但是,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闻此消息已经热血沸腾,他们无法等到5月7日。亲历五四的许德珩回忆:“五月二日,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”,“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,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,讨论办法。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,写血书,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。”

北京大学学生当年举行聚会活动的地点,大都在这两处:一是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学生宿舍,这是一个很大的中式院落,在沙滩红楼建成以前,北大学生的食宿都在这里。因此,各种消息首先在这里传播,许多活动也首先在这里展开。另一处是位于北河沿的法科礼堂。凡是人数比较众多的聚会,尤其是联合其他院校的集会,大都在这里举行。

5月2日,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就在西斋饭厅开的紧急会议,然后发出通知,决定5月3日晚7时,在北河沿的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,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。

5月3日晚,北大校园内人声鼎沸,熙熙攘攘,还未到开会时间,闻讯而来的学生已经聚集了1000多人。同学们大骂曹汝霖、章宗祥和陆宗舆等秘密签订高济、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卖国行径,大家激昂慷慨,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自己内心愤慨的。

大会开始后,《京报》主笔、北京大学“新闻研究会”讲师邵飘萍向学生们报告了山东问题。接着,北大学生张国焘、丁肇青、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,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,“均极痛哭淋漓”。台下学生“掌声雷动”,会场场面十分热烈,表现出群情激奋、慷慨悲壮的气象。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,在情急中当场咬破手指,撕断衣襟,血书“还我青岛”四个字,在场学生无不感动。

在爱国激情的鼓舞下,大会做出四项决议: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;二是通电巴黎大使,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;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;四是集齐天安门,举行学界大示威。学生们一致同意第二天,即5月4日就举行全体游行示威。当场,学生们就自动进行捐助,银元、钞票、铜元以及手表、戒指、毛巾、帽子等,纷纷捐掷到台上。



◆书名:《建党伟业》  
◆作者:张珊珍  
◆出版社: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——陆游

利用一个人,利用他的脆弱,未经本人同意就剥夺了他的生命是对的吗,即使这样做使他人受益?

对于任何一个对达德利和斯蒂芬斯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而言,第一种反驳似乎只是一种温和的抱怨。它接受了功利主义的这一假设——道德就在于权衡得失,道德仅仅期望一种更完备的、对社会结果的估算。如果杀害这个船舱男仆值得引起人们道德上的愤怒,那么第二种反驳则更接近要点。它反驳这样一种观念:正当的行为仅仅是结果——代价和受益的一种算计。它暗示道德意味着更多的东西——某种与人类恰当地对待他人的方式相关的东西。

这两种思考救生艇案例的方式可以阐明两种不同的正义进路。第一种进路认为,一种行为之道德与否仅仅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后果。正当的行为:就是人们经过综合考虑后所作出的,任何能够产生事物最佳状态的行为。而第二种进路则认为,从道德上来说,结果并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全部。某些义务和权利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,而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依赖于社会性的后果。

为了解决救生艇一案,以及许多我们通常遇到的、不像这么极端的困境,我们需要探索一些更重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问题:道德就是计算生命权衡得失呢,还是某些道德责任和人权是根本性的,以至于它们超越于这样的算计?如果某些权利在这方面是根本性的——假如它们是自然的、神圣的、不可剥夺的和无条件的——我们该如何甄别它们呢?又是什么使得它们具有这样的根本性呢?